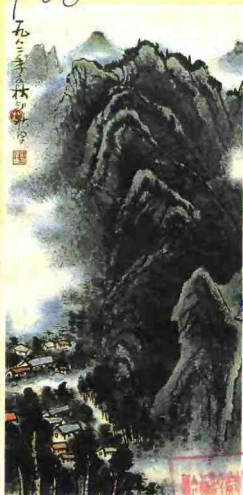


1906



和平县政协文史组印

和平文史

夜王

送第3期

86

和平县政协文史组印
资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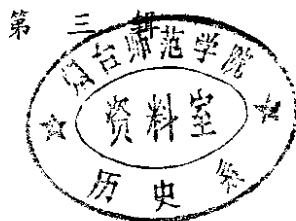
和平县政协委员会文史组编印

赠阅

15

4472/24

和平文史



和平县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六年八月

和平文史（第三辑）

目 录

邓颖超同志在政协第四次全国

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黄 森	（3）

和平县近现代名人徐傅霖	徐金池	（9）
关于宪政提案的一场舌战	邹韬奋	（25）
南方民盟斗争史略（摘录）		

.....郭翹然 李伯球 胡一声	(29)
忆徐傅霖先生.....	陈平钧 (33)
我对徐傅霖在广州的一些回忆.....	徐声洋 (38)
徐傅霖关心桑梓二三事.....	徐金池 (41)
徐傅霖论写诗的一封信.....	陈小白 (44)
忆记徐傅霖之道德文章.....	徐景阳 (46)
徐傅霖与林寨友人遗事.....	陈平波 (51)
徐傅霖轶事一则.....	袁启明口述 叶树荣整理 (54)

和平自有才人出，举人进士留芳名

——和平县明清两代举人进士考略……徐金池 (56)

一种有趣的文艺活动——考对子……凌炬青 (63)

各地文史简讯五则…… (65)

湖南出版《曾国藩全集》

广东出版《陈济棠史料专辑》

新会成立梁启超研究室

梅县市成立宋湘研究组

江门市成立陈白沙学术研究会

封面国画 《五花嶂远眺》（和平八景之一） 林镜秋

封面题字 郑继昌

封二题词 何 平

封三题诗 陈景文

主 编 徐金池

编 委 叶镜泉 林观佑 徐金池 黄石筹 何松杏

邓颖超同志在政协第四次全国 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政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我们政协机构的性质，包括参加政协的单位，包括政协的几个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做决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今天我们不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会议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专业会议，我仅就这个专门问题来讲一点意见。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它跟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它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所以，从形式上，从工作内容上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他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的工作都可以包括到它里头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一动一静，截然不同，但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因此，我们说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说静的工作又可以转变为活动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去讲征集的时候要活动，就以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来说吧，文史资料工作是能够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你们会上的材料和第九号简报都说明了这方面的好经验。在《广东试向港澳和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这个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言：只要祖国需要一定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做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使另一些人缩小了同我们的距离，有的甚至考虑回国定居。这不是把静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所以，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要重视它，而且要像刚才杨成武副主席说的那样来进行。他的发言，我都拥护，我只补充一点，我们文史资料工作是要埋头伏案在那儿编辑，然后付印出版，看起来好像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资料拿出去以后，马上就会起到活的作用。这个文字工作就跟我们统一战线的其他活动性工作一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和影响。再说一点，就是今后要注意提高文史资料的质量。要广征精选，对收到的一些材料，不要因不符合我们的观点，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目标，不符合我们原来的原则就轻视它。只有实行广征精选，文史资料出版的质量才能提高，它的作用才能随之而扩大。

（原载《广东文史通讯》1985年第一期）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黄 森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在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下开展起来的。至今已有二十六年的历史了。二十六年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十二年），在各级政协、历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征集到文史资料达四亿多字，编印出版史料一亿多字。这项工作，在它的自身发展中，已逐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性，不仅为史料的积累和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而且丰富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式和内容。

政协文史资料的特性，可以举出许多方面。比如它是历史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亲闻亲见，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和追述，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它是综合性的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社会以至三教九流等各个方面；它也不局限于为史学界提供研究的原料，

而且直接出版了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史料知识读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活的教材。但是它最基本的，或者说最本质的特点，是在于它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进行工作，而又以其工作的成果促进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点在全国政协章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因而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文史资料工作可以而且已经在促进爱国统一战线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首先是，通过史料的征集，可以广泛调动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一九五九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茶话会上，语重心诚地希望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除了“把自己的知识经验留下来，对社会有所贡献”外，还要求他们写些回忆录。他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许多老年人是经历了四个朝代的公民，应当从各个方面“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得到委员们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单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粗略统计（不包括地方政协），至今已有六万多人次提供了资料。

第二，文史资料的作者和读者，从历史的回顾和再现中，可以更深刻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结成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文史资料的撰写人，使自

已在重温历史中，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则可以从文史资料具体生动的事实中，受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不能得到的感染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一九八三年创办的青年文史读物《纵横》深受青年的欢迎，印数达到三十万册，就是证明。

第三，通过文史资料的出版，使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对民族解放事业、对社会进步作过贡献的人物的名字及其光荣事迹载入史册，这样，不但使该历史人物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地位，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他们的亲朋和战友也是极大的鼓舞和慰藉。去年全国政协和全国侨联纪念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派人去香港组稿，受到陈先生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学生盛情接待。有的人专程从新加坡到香港给我们写稿，有的人派专人送稿子回国，热心提供陈嘉庚先生的珍贵照片和手迹等，积极协助我们向海外发行回忆陈嘉庚的书和画册。我们发表了张伯苓（原南开大学校长）、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的史料，在其友好和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篇传记温暖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我们编印了《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一书，使黄埔同学深受鼓舞，进一步认识到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的真理，表示要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作出新的贡献。许多人从发表的文史资料中，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只要为国家民族做了一点好事，共产党就不会忘记他们，人民就不会忘记他们。

第四，文史资料实事求是地揭露反面人物的历史，可以使之在人民当中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通过了解旧中国的政

治和社会问题，分清历史是非，从而更加深入地启迪今人，教育后代。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征集文史资料还可以对落实政策起到调查研究和促进的作用。例如，《武汉文史资料》发表了一篇《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的文章，写的是在中华大学当了四十年校长，解放后被判十二年徒刑并早已去世的陈时。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这篇资料与原判有很大出入，引起了重视，指令原判单位黄陂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经过调查研究，仅用八个月时间，就实事求是地作出了重新判决，宣布陈时无罪，撤销原判。

综上所述，正如邓颖超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的：从形式上看，文史资料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它在那里埋头伏案，看稿子、思考、研究、编辑，然后印刷出版。但是从效果上看，这种“静”的工作，可以发展为“动”的工作，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文史资料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是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进一步 发挥统战作用的正确方针

尽管文史资料工作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也出

现过一些偏差和不足。譬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种说法：文史资料工作也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得征集面受到限制，一些撰稿人有所顾虑，未能秉笔直书，甚至在稿件中多有检讨、认罪之词。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

“四人帮”把这种“左”的倾向，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污蔑文史资料是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为“牛鬼蛇神”树碑立传，并以文史资料的内容作为肆意迫害民主人士的“铁证”。这不但否定和歪曲了文史资料的政治作用，而且严重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毁损了党与民主人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一九八三年召开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纵观近百年来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从康、梁戊戌维新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贯穿其中一条红线不就是近百年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吗？在漫长的岁月里，多少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呕心沥血，奋斗终生！多少爱国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勤奋工作，为振兴中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爱国主义是我们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坚实思想基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体现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扩展视野，进一步扩大史料的征集面。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工

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征集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对国家民族作过重要贡献的知名人士的资料和各行各业中具有时代建树的人士资料”。这些人，不管他们属于何种阶级、何种党派，只要他们反帝、反封建，主张民主进步，对国家民族有过贡献，我们都可以征集出版他们的史料；不管他们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要在学术上、事业上有时代建树，我们就要肯定其功绩。

扩大征集面，一个重要的新课题，是如何开拓港、澳、台及海外的征集工作。海外侨胞散居世界许多国家，有上千万人，连同他们的后裔有数千万人之多。他们远离祖国，但他们的心同祖国息息相连。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无不饱含他们的血汗和赤子之心。解放前后，许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和各界人士移居欧美、东南亚和太平洋洲等地，他们当中许多人心怀故土，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港澳地区的同胞更与祖国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方面，蕴藏着丰富的近代史料，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征集工作。现在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订，海峡两岸人民交往的增多，为我们开展海外史料征集工作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积极开展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空前剧变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各方面人物的沉浮，都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接50页）

和平县近现代名人徐傅霖

徐金池

浏东好

蹲虎跃飞龙

岭南紫云钟秀气

和平徐老蔚人文

爱国内外闻

——调寄《忆江南》

徐傅霖（1878～1958），字梦岩，广东省和平县下车区石含乡李坑村人。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九日生於耕读之家。其父徐鸣珂，秀才，1881年故。徐兄弟姊妹四人，由母陈氏抚育成长。徐七岁入立雪斋村塾，后赴县龙溪书院读书，熟读四书五经，曾受系统的传统教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后邦廩^①。曾进读鹅城“丰湖书院”，与陈炯明为同年同窗好友。

戊戌维新前后，徐谈了一些传播西方民主自由的书刊，开始关心时务。为了追求新知和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乃弃举子业，在邑人亲友陈襄廷、陈竹溪、徐明川、周师曾等资助下，赴北京就读京师法政学堂，与杨永泰为同班同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获法学学士学位^②。在此期间参加同盟会^③，开始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年）被举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④。曾与陈炯明力主禁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11月下旬广东光复，成立广东省临时议会，徐傅霖、杨永泰、司徒颖等九十六人为议员^⑤，其中有女议员十人。当时，徐主张女子参政，男女平权。曾写诗云：“深闺韬蔽数千年，今始争得参政权，娘子军兴锋正锐，夫人城比铁尤坚，临朝武后曾称帝，炼石娲皇乃补天，国事大家同负责，于情于理亦当然”。徐曾积极参与通过议案，支持都督胡汉民筹款一百六十万元，以作军政费用和派遣丁颖、林云陔、刘纪文等大批青年出国留学，培养人才。

1912年（民国元年），广东省临时议会选举徐傅霖、杨永泰、司徒颖、卢信四人为国会临时参议员赴南京开会^⑥。故徐得以参加中华民国开国盛典，并参与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着，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继孙中山任大总统，迁都北京，时国会设参、众两院，徐被选为众议员，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13年（民国二年）春、夏间，因袁世凯刺杀宋教

仁案和“善后大借款”事发，七月，孙中山组织武装讨袁，是谓“二次革命”。九月，“二次革命”失败，袁乃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民党籍之参、众议员。孙中山、黄兴等大批国民党人亡命日本。徐受通缉，乃东渡日本，专研国际公法和编中国外交史，并联络同志继续革命活动。当时他曾写道：“强权以外无公法，历史之中见国情，西望神州云黯淡，黄河如带几时清”（复徐玉芬），“掉我三寸舌，奋我七尺身”、“欲将新邦造，一跃列群伦”（致徐明川）。

当袁世凯篡国阴谋毕露，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湘督谭延闿、皖督柏文蔚起兵讨袁时，袁遂逮捕在京之粤籍众议员伍汉持，指与四督同谋，枪决于菜市，以杀一儆百，向国民党示威，陈尸刑场，无人敢为殓殓。徐挺身而出，筹款七千元购棺往殓，运之回粤，并将余款在广州设汉持医院，以资纪念⑦。

1914年（民国三年），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改五色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因在革命和组党问题上意见分歧，黄兴、徐傅霖等拒不参加。黄兴在东京另组“欧事研究会”，张耀曾、徐傅霖等则组织“政治学会”（简称政学会）。（当时西南地区的实力派，如岑春煊、唐继尧、李根源、杨永泰等都是“政治学会”重要成员。后称“政学系”，是国民党内二大派系之一，张群、吴铁城等是该系重要领导人）。

1915年（民国四年）秋，“筹安会”出笼，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徐由日本回到上海，与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四人通电反袁，并于沪创办“政治学会”喉舌《中华新报》，徐任主笔，揭露声讨袁的罪行。是年冬，蔡锷在梁

启超支持下，回滇会同唐继尧、李烈钧、李根源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徐被任为护国军驻沪代表，联络各方。徐曾与温宗尧、莫荣新电请南洋岑春煊回国，并策动广西陆荣廷响应护国军出兵长沙。袁世凯众叛亲离，翌年三月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称大总统。

1916年（民国五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会重开，徐仍任众议员。在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所谓“府院斗争”中，徐与国民党张熊等组织的“宪法商榷会”一起拥黎，抵制拥段的“宪法研究会”。翌年五月，段被黎免职。但当段祺瑞于天津马厂誓师讨逆，击败张勋复辟后，徐又认为段“再造共和”有功民国。

1917年（民国六年）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去职，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拒绝恢复旧国会，并废除《约法》。徐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护法。九月，徐出席在广州召开的非常国会，成立南方护法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1918年（民国七年）5月，在旧桂系武力支持下，政学会将南方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推举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1920年5月增选温宗尧）为总裁。孙中山被迫离粤去沪，岑春煊为主席。当时广东属桂系势力范围，军政府实为政学会和桂系掌权，莫荣新任广东省长（督军），杨永泰任财政厅长（后任省长），徐任高等审判厅长⑧。

1919年（民国八年），徐升任南方护法军政府大理院院长。翌年又任司法部长（沈钧儒任总检察厅检察长）。

徐连续执掌司法大权，刚正不阿，甚为廉洁，大总统特授二等大绶嘉禾章⑨。

1920年（民国九年）10月，孙中山命令陈炯明领导粤军从福建回师广东，军政府瓦解。同年十二月，徐被执，谓助桂为逆，以内乱罪判无期徒刑。后因陈炯明、邓铿、邹鲁等居中缓颊，乃于1921年5月特赦出狱，离粤北上，转杭州西湖疗养。一次，轮经台湾海峡，心潮汹涌，曾写《台湾峡》诗云：“道是台湾峡，台湾何处寻，思随潮共起，恨比海尤深，割地多年耻，复仇万众心，可怜吾国内，灾祸迭相侵”。

徐居官廉介，却遭孙中山捕判，后虽获释，但由此不满孙中山。

1922年（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6月，恢复旧国会，黎元洪复任总统，徐续任众议员，并受聘为总统府顾问。

1923年（民国十二年）10月，曹锟为取代黎元洪，进行贿选总统。徐傅霖、沈钧儒等拒贿议员在上海《中华新报》公开发表宣言，反对贿选。当时，天津《大公报》记者张季鸾曾为文誉之为“清操可佩”。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徐在北京，与直、皖、奉系要人时相过从，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异议。

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共合作北伐胜利，北洋政府瓦解。宁、汉合流以后，国民党宣布实行“训政”，排除异己，一党专政。徐认为：一党治国，不是“天下为